

书: 图书馆学永远的 DNA

The Book is DNA of Library Science

陈业奎

Chen Yekui

摘要 我们需要反思脱缰野马式的图书馆学外延式发展方式。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应是“书”。主流不是“书”的图书馆学必然要受到学理批判与实践批判。参考文献 3。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学理批判 实践批判

Abstract: We need to rethink the overstated extended developing way of library science. The core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book”. If not, Library science is certain to be criticized from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Critique; Practice Critique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作为我国学术期刊方阵的重要板块,与我国众多的学术期刊一起,为我国学术的真正推进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同时,季刊变双月刊,双月刊变月刊,月刊变半月刊,增加版面等爆炸式的扩容,也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本来已经十分庞大的学术队伍的不断扩张和大量低水平“学术成果”的复制开了绿灯。以笔者个人的经历来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曾发表过文章的刊物《情报资料工作》每期寥寥几篇学术论文。如今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发文数量之大是过去不敢想象的,通读一遍,力所不逮,奢谈研读!

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批评最多的还是学术质量问题。由于图书馆的实践还在,现阶段还不至于让人们发出“图书馆死了”、“图书馆学理论死了”这样石破天惊之语,但“沉闷,疲惫,衰竭”评价之声也不绝于耳:词语混乱,复制与模仿其它专业的话语模式;对现实摸不到边,没有中国经验当下的享受;没有历史视野;散、乱、“专业化”程度不高;期刊编辑水平偏低;部分研究者心思在于科研项目获取与文章的销路,不在乎是否具有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创新等学术研究者应有的基本品质;理论研究浅尝辄止,缺乏诸如学术批判等理论内化与进化的过程,等等。论者言之凿凿,确实如此。但这些表象虽然重要却非核心与实质,核心性与实质性要害在于中国学术自身,当然包括图书馆学自身及其评价机制。有关学术体制问题的探讨太多,有关图书馆学

批判的论述不少,本文不累其述。笔者想说的是,人们在评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评价机制时却忽略了对“图书馆学主旋律”的评价。

笔者认为,如果不反思这种脱缰野马式的图书馆学外延式发展方式,不反思“图书馆学主旋律”,不批判对“书问题”认识的浅薄,不批判放弃智慧的愚蠢行为,图书馆学必将“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1 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应是“书问题”

1.1 不研究“书问题”的专家越来越多

图书馆学也有学科研究立场者与领域研究者,大部分学者为领域研究者^[1]。这样划分固然粗糙,但不失洞察力。学术细化时代,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图书馆学研究者队伍中很难出现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图书馆学也很难出现黑格尔式的大一统理论。图书馆学者也是如同英国学者贡布里希所说的那样,“很小的事情上面知道很多的人”,或如同当代著名思想家施特劳所所说的“关于越来越多的事情知道越来越多的专门家”,在非相关领域研究者来看,“所谓的专家,就是一个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越来越多的人,以至于到最后,专家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2]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出在图书馆学的整体效应上,出现在群体的主旋律上,出在图书馆学 DNA 上,尽管人们对图书馆学的 DNA 只能进行粗浅的解读与借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坊间于图书馆的认识为“看书的地方”，图书馆的工作为“借书还书呗”。话粗理不粗！学者修饰更为高雅，对图书馆“知识的喷泉”、“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对图书馆的工作“知识的导航”。无论如何理解、修辞，图书馆如何发展“看书、借书、还书”这些基本功能没变。图书馆应培养出并且能够培养出研究“书问题”的专家，这些专家能够指导与引导人们读书。

图书馆学应是一种风度，一种气象。其表现之一，敞开胸怀欢迎各种与各方人才加入。就研究者队伍来说，无论学业出身如何只要投入图书馆的实践都可能在图书馆专业学术上有所作为。从实践来看，许多出身于其它专业的学者，如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出身于化学专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图书馆学家。许多从事其它专业的教授承担图书馆的领导工作。其表现之二，提倡研究者视野开阔。大阅读时代，传统的阅读概念已经被超越。图书馆学活动中既有时代性的内容，也有超时代的内容。一个可进可出的常住地是家园，一个不可自由进出的常住地是牢笼。当图书馆学固有的理论缺乏社会和文化解读力的时候“越界”和“扩容”这一学术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比如，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从法学原理出发研究“图书馆合理使用文献的法律问题”并在法学界与图书馆学界有了一定的学术与实践影响，部分图书馆人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研究“公共图书馆问题”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着力点与归结点是“书问题”或者“书衍生问题”。

就学术旨趣而言，西方人容易想起“趣味无争辩”这句古老的格言，中国人容易想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俗语。对别人的情趣的评价，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作为有权享受学术自由的个体来说，学术自由与学术旨趣不放到“书问题”上也不为过。许多人把图书馆工作当作发展的平台，然后再到其它专业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其成果不应该标榜为图书馆学，这样的人才不应该标榜为图书馆学家。

从来就没有“上帝之学”，图书馆学如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定性、局限性。跨出去就不回来，是无垠的游荡，已经远离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

的本意了：图书馆人自己就不看书，不热爱经典，不热爱“借书、还书”站柜台工作，认为从事网络维护工作比借书、还书工作高雅，对图书馆的业务不熟悉，那就不好了；如果发展到图书馆学在研究一切，就是主流不放在研究“书”或者有关“书”的衍生问题，那就不好了；如果发展到具有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博士、硕士头衔者都以研究“网络”，研究“信息”，研究“情报”，“搞企业情报的”，“搞网站的”，“搞法律的”，“搞哲学的”等时髦或者其它“大气”之学为荣，羞于谈论研究“导读的学问”、“订购书的学问”、“借书还书的学问”、“分类的学问”、“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的学问”、“借书还书涉及的法律问题”、“文献复制转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那就不好了；当研究者盯着网络的繁荣，但对当今许多地市没有图书馆甚至仅仅有图书馆的外壳、许多高档城市社区就根本没有图书馆的现实视而不见，那就不好了；当越来越多对人类书史、读书史知之甚少者成为图书馆学专业教授、博导、博士、硕士、研究馆员，那就不好了。疯狂的外延式的发展给图书馆学披上“皇帝的新装”——不看书，不懂书，不研究书问题，不研究与书有关问题的专家越来越多。许多研究“信息”、“情报”快速发文、快速获得诸如学位、职称申报成功的“榜样作用”，让本来就生活在浮躁社会的年轻图书馆人，本来就为了读博、读研而阅读原著少的图书馆后备学子更加急躁，越来越远离笔墨书香了。笔者的个人体会让人痛心，在讲主题为“百科全书”的业务课时，竟然有许多热衷于申报国家级项目与顶级刊物发文的馆员、硕士不知道“百科全书学派”、不知道“狄德罗”，不知道“文艺复兴”！竟然有许多图书馆人不知道类书与百科全书的异同！

1.2 图书馆学人应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

有学养的图书馆学人应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指出时弊。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批判“不研究书问题”的图书馆学风气必将从通俗走向低俗、鄙俗甚至恶俗。

当图像时代到来的时候，图书馆学家不是歌颂这个时代，而是要说出图像时代“读书少”的社会风气带来的浅薄化。当通俗文化到来的时候，图书馆学人的任务是说出通俗文化缺乏深度的弊端，说出社会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当网络时代到来的时候，

科技不是一切,科技之外需要一种人文立场。仅有技术的图书馆学是不够的,有些问题是技术解决不了的。图书馆人应呼吁,从“读网”、“读图”回到“读书”,读书永远是美好的。研究“书”问题的图书馆学是有前途的。令人欣慰的是,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一直存在对“书问题”研究情有独钟者,其研究成果成为学术典范,比如,王波先生的“阅读疗法”、秦柯先生的“数字化版权研究”、包和平先生的“民族文献”,范并思先生的“图书馆精神”,等等。

2 学理批判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没有学理的批判不是学术批判,是情绪。图书馆学队伍中少不了“雅典的牛虻”苏格拉底式、“批判哲学”康德式、“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和批判的”马克思式的学术批评家。这样,图书馆学才能深刻与智慧。

我们不妨从“问题意识”、“方法论”、“学术经典”、“阐释方式”、“学术交往”几个方面来考察图书馆学,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2.1 问题意识中“书”的缺位

问题意识就是学者的敏感,是原创的冲动,是原有的心灵秩序的打破。现实是,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书问题”不敏感。“书”已经消失于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视线了。

问题意识是一种独有的“冲动”,也是一种情。“书”应是图书馆学者情归之处。学术活动中既有“书”的内容,也有超越“书”的内容,既要脚踏“图书馆”这一实地,又要“仰望天空”。我们图书馆学应拿出这样的风度,应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图书馆学更能给以裨益。但是,图书馆学的主流指向应少不了“书”。在一般人的逻辑思维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视书如命,是吸取书甘甜乳汁最充分的人。最朴素的道理,图书馆工作人员是“靠书吃饭的”,理应体会到,对图书馆事业的认识与理解离不开的核心与关键字应为“书”。以此思路,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应该对“书”有“敬畏”情结,谈到“书”应该兴奋与激动。由于问题意识中“书”的缺位,部分图书馆学人就不可能情系在“书”上。当今有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不再对“书”、“读书”、“管书”缠绵,没有对研究“书”问题真情付出。

2.2 方法论中没有“书”的自觉

从方法论中可以看出业余与专业的区别。业余者或者研究水平低者在方法论方面往往缺乏系统的训练,往往把一般分析手段或常规逻辑方法当成自己的核心方法。照这种方式来研究,结果难免是用常识性理解压倒或取代学术性的阐释。部分图书馆学人研究“书问题”方法与模式多为常识性的理解与阐释,常常述而不作,或为其它专业方法的借鉴。也有图书馆学研究者走交叉科学之路。以此思路取得的成果,当然也有精品,但很难见到图书馆学自己的方法。有许多人利用图书馆人特别是图书馆学期刊编辑对其它学科方法论不太熟悉的机会在图书馆学“混”,大走“学术机会主义”之路。其看似手段新颖之作,在其它专业看来实为常识。

图书馆学方法论中有关“书问题研究”不具有本土特色。尊重其它专业学术,并不是说图书馆学只能一味“模仿”与“克隆”其它专业;并不是说“被捆住手脚”而没有作为,也不是说我们的学术只能在狭小的天地中“自成一统”,在自我封闭中“顾影自怜”;也并不是说,其它专业研究者可以越俎代庖。相反,图书馆学定性研究应显得千姿百态、流派众多、凸显各自的“本土特色”。当今图书馆学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有但少。像过去那种“书目”、“目录”、“分类”、“导读”等由图书馆学人首创的方法少之又少。

方法论是学术利器,方法是图书馆学人的“达摩斯利剑”。方法论不断进步的图书馆学才能给图书馆人信心。马克·吐温曾说,一个手拎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借这一比喻,我们形象地说明,有了“锤子”人研究问题才“有力”。方法论进步的学者,才能完成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质的飞跃。

2.3 经典少,著作中越来越难觅“书”元素

经典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第一,经久不衰;第二,具有典范性或权威性,具有良好的声誉,具有良好的品质;第三,是经过了历史选择的,有价值的书。“所谓的经典是经得住历史批判的一切。”经典的作用是,影响人们的心智。

当今的图书馆学成果可成为经典者能有多少,这个要靠历史来说明,但我们可以看出趋势。这一

趋势是,经典越来越少。图书馆学大师级队伍承担国家级省级项目越来越多,但奉献出的学术经典越来越少。因而,当今的图书馆学不能足够影响人们的心智。

2.4 阐释语言中缺乏“书”的影子

由于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限制,图书馆学的阐释语言中缺乏“书”的影子,充斥着“信息”、“情报”、“控制”、“博客”、“短信”等等。像过去那种充满着“索引”、“书目”、“目录”、“读者”等图书馆人熟悉的与“书”相关词汇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少。毫不夸张地说,去掉杂志的书皮,去掉题目中的“图书馆”三字,让人猜想许多论文学科的隶属,恐怕是件难事。

2.5 学术交往中逃避“书”的话题

大凡有学术成就者离不开学术交往。作为学术交往形式之一,外延式交往。学术研讨会本来谈论最多的应是“书”的问题,但事实不是这样。以笔者参加的大量研讨会来看,大家关心的多为发文问题而不是学理问题。

学术交往的另一种形式,内涵式交往,如学术反响、学术引用、三次文献引用与被引用等。在与其它专业的学术交往中,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话语权不多:被其它专业引用者较少,影响其它专业人士的心智者少。以我国著名的三次文献《新华文摘》来说,就没有对图书馆学单独立类,仅仅把图书馆学归类为“读书与传媒”中。这种现象说明,图书馆学对其它学科的影响有限。我们用大家认同的话语、规范来阐述、言说,超越学科的障碍,找到走向世界的通衢,拥有“本土特色”的一套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别人没有做过或做的不够的研究,取得具有自身特点的高水平的理性成果,那人家自然会愿意与你对话,与你商讨,诸多的学术交流自然会水到渠成。“书问题”研究本应是其它专业没有做到的或者做的不够好的,我们是有足够的话语权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出版传媒专业做的就比我们好,他们有许多诸如《中国官员读书状况调查》对社会有影响的好文章。这也形成了关于“书问题”研究的“‘围城’现象”——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也形成了悖论现象,图书馆大发展,图书馆学不关注。

3 实践批判

当理论批判无力时,我们更渴望获得实践的力量。

3.1 现在是反思“信息主义”的时候了

如何避免信息方法的泛化成为信息时代的一个“逆向问题”。信息方法的泛化可以导致信息方法的“失效”。将“信息”视为万能的解释装置,结果常常会适得其反,用信息什么也解释不了。方法论信息主义一定程度上使信息成为一个“大口袋”,成为解释力贫乏的避难所,以至于一切说明不了的问题都归结到信息那里:什么都没了,总还有信息;什么都化解了,总还有信息;什么都分析掉了,总还有信息。信息成为一个强制性解释的万能词,也就逃避情绪的遁词,如同麦克·卢普所说的,信息成为“适用于一切目的的遁词”^[3]。

就图书馆学而言,以“信息学”来代替“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就是后现代思想。从事图书馆学工作与研究者羞谈“图书馆”三字,以“情报”、“信息”为时尚。这种思想使得图书馆学成为一个时髦的学科,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那样的图书馆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缺乏人们敬畏的条件与内涵。

信息不是一切,只有信息没有知识的人是悲哀的。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记忆事实与作出判断的习惯方式,挑战了传统的思维习惯。全球知名研究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搜索引擎等确实深刻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习惯。从乐观的角度看,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利用将减少人们对事实和知识的记忆,而把脑力更多地放到信息综合以及批判性思维上面;从悲观角度看,如果人们缺乏清醒认识与必要训练,最终将因过于轻信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传递的“事实”而做出错误判断,或者过高估计自身力量,最终因预期破灭而产生深刻的挫折感。

3.2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更需要读书

现实来看,我们处在一个书呆子太少的时代,如柏拉图、孔子那样的糟老头太少,一个术盛道衰的时代,一个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靠论文来获取利益的时代),一个网络扰乱人们心灵的时代。

当这个世界匆匆地来到新世纪时,原来认真阅读严肃图书的那个行为似乎已经变成了挽歌的举动。我们是否对我们认定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产生质疑? 2011年3月中国发生的抢盐事件,因为人们从口口相传中得知,碘盐可以抵御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伤害。这便是科学精神的欠缺。

网络民主的最大弊端是业余者取代专家主宰了当今文化。用户自由生成的内容成为主流,知识精英靠边站,其结果必然会威胁人类的核心文化传统。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献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实践来看,中国更需要审美诗意、道德情怀、精神理想、自由想象之美这样的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不是健全的人。只懂理科知识没有文科知识的人,被斯诺称为“半个文盲”,被恩格斯称为“半通”,被马克思称为“职业的痴呆”,被哈耶克称为“科学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

毋庸置疑,优秀的小品与短信富有自由想象之美。但其审美情趣无法取代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享受。这一问题说明我们的阅读氛围不好,是后现代主义带给人类的悲哀!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是留给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两个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来”,这些难题留给人类思考多年。我想答案中无法绕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匮乏、中国人的阅读氛围不好”。

“信息主义”妄想毁灭图书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以弘扬人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为己任的

图书馆学更应坚守“倡导人类读书”的理念。

4 让“红薯”烧烤得更香甜更诱人

“信息”犹如西方快餐一样时髦。对“信息”研究的成果当然可以借鉴,但“书”犹如生活中的“红薯”一样让我们感到亲切自然。图书馆学把“书”研究好犹如将“红薯”烧烤得更香甜一样,更能符合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口味”。无论现实如何,只要人类发展,就离不开读书,因而图书馆学仍然要存在。人类必将反思自己的浮躁,人类不可能永远选择浅薄、背离深刻、放弃智慧,读书早晚要成为人生命旅程中的重要部分。图书馆学不是显学,也没有多深奥。未来的图书馆学仍应是朴实的。只要用心,图书馆人做出富有实践意义的学问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心里应该有“书”。如果心里根本没有“书”,那你把图书馆学还给“我”! 我们渴望大家都听听图书馆学的呼声吧。“热爱书吧!”不但是图书馆送给社会的最强音,也是送给图书馆学人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 1 陈业奎. 学科研究立场与领域研究立场 [J]. 新世纪图书馆, 2009 (2): 8
- 2 彼德·A·劳伦斯. 学术论文产出的“政治经济学” [N]. 科学时报, 2003-4-2 (3).
- 3 肖峰. 信息方法与方法论信息主义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京), 2009 (6): 68

(陈业奎 副研究馆员 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收稿日期: 2011-04-13